

\* [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本栏目2006年第4期主持人语曾提出中国侠文化“在研究对象上不仅仅局限于武侠小说”,既可“从狭义侠文化向外延展”,也可“从广义侠文化向内深入”。当下武侠小说高潮渐消,而广义侠文化表现却“异军突起”。司马迁曾说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而“有足多者焉”。2009年5月5日,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聚财过亿被双规,他自称是替矿主们“排忧解难”。《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碰到一个中年人公然宣称:“穆二小就是个大侠!劫官济贫的侠客。”穆新成因此被称为“侠贪”。无独有偶,在重庆“打黑风暴”中于8月7日落网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原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级警监文强,也是所

谓的“讲豪侠、重义气、急人之急”,“喜欢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是一个性情中人”。由此可以看到,侠文化作为社会主流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一种中间产物,即“侠规则”,其负面影响已极大凸显,记者不禁感叹,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黑色幽默”。那么,超越武侠小说而进一步研究侠文化更广义层面的社会文化意义,尤其是正反两方面的不同价值层面,就已经成为于当前甚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期的两篇文章,王学振研究了老舍对作为一种民族精神资源的“侠”的态度,以及老舍最终的“反武侠”姿态;吴安新和李玲则从私力救济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侠文化的两面性。这些研究,相信都可以为我们正确对待侠文化提供借鉴。

## “武”的退隐和“侠”的张扬:论老舍与侠文化

王学振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市 400047)

**摘要:**作为一个出身于下层民间并为民间文化所深深浸染的作家,老舍好“武”崇“侠”,由此又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面对着古老中国被迫进入世界殖民体系之后的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老舍为“武”这种前现代技能唱了一曲深情的挽歌;同时,他又试图将“侠”的气质作为国民性改造的一种精神资源,通过激活、改造传统文化中“侠”的因子实现新民强国。老舍与侠文化的关系,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武侠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老舍;侠文化;现代化;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6-0033-05

中国侠文化“在研究对象上不仅仅局限于武侠小说”,既可“从狭义侠文化向外延展”,也可“从广义侠文化向内深入”<sup>[1]</sup>,本文探讨老舍与侠文化的关系,就是由此出发的一个尝试,望能抛砖引玉,对侠文化研究和老舍研究有所助益。

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下层民间文化有深刻的影响。”<sup>[2]</sup>老舍出身于下层旗人家庭,在民间文化滋养中成长,与活跃于民间的侠文化产生了天然的联系。

首先是亲友的侠义性格对他的濡染。他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sup>[3]275</sup>而老舍的母亲恰恰具有好客、自尊、刚强、讲义气、乐于助人等侠义性格。街坊宗月大师(刘寿绵大叔)更是一

“历史上的游侠行为与文艺中的武侠文学所形成的中国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形

\* 收稿日期:2009-04-08

作者简介:王学振(1969-),男,湖北江陵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07JC51017),项目负责人:王学振。

位仗义疏财的长者，他“是个在金子中长起来的阔大爷”，心中却无贫富之别，为举办慈善事业而散尽了偌大的家财，出家为僧后衣食无着，仍不改济世救人的初衷。在大师的赞助下，老舍才得以踏进学堂之门。大师的义举既改变了老舍的命运，也对老舍的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师坐化之后，老舍深情地写道：“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sup>[3]180</sup>

其次是民间文艺的侠义精神对他的熏陶。从母亲和街坊那里濡染了侠义性格的老舍，对那些宣扬侠义精神的民间文艺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曾多次回忆与罗常培等同学去听侠义故事的情形：“莘田是我自幼的同学，我俩曾对揪小辫打架，也一同逃学去听《施公案》。”<sup>[3]164</sup>“下午放学后，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sup>[3]393</sup>除《小五义》、《施公案》外，年幼的老舍还读过《三侠剑》与《绿牡丹》，听过《五女七贞》等评书。

作为民间文化形态之一的侠文化，于不经意间对老舍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造就了他好“武”崇“侠”的个性特点。

黄天霸们能够锄强扶弱，仗义行侠，前提之一是其武艺高强。也许是出于对这些侠客的崇拜之情，老舍很早就对武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山东时还特地购置了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拜师学艺。老舍习武达数十年之久，先后练习过剑、拳、棍、气功等多种武术。老舍习武十分勤苦，无论寒暑雨雪从不间断，因而对武术颇有心得，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剑术的《舞剑图》，其精妙的拳术曾引得《学生画报》的记者陈逸飞要拜他为师，还曾在晚年访日时赢得日本友人的由衷敬佩<sup>[4]</sup>。

好“武”的老舍更为崇“侠”。早在孩提时代，侠客们的传奇故事就激发了老舍对“侠”的向往：“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sup>[3]532</sup>成年之后的老舍，当然不会继续其当“黄天霸”的幻想，但他却将侠义精神内化到他的血肉之中，形成了待人处事的侠骨、侠气。他急公好义，疾恶如仇，体现了一种“侠”的气度：“朋友有难，不问情由，四处奔走，鼎力相助，这，就是老舍！”<sup>[5]</sup>“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光明的动机，纵然善于花言巧语，他也必正言厉色，给对方一个‘下不去’。”<sup>[6]</sup>抗战爆发后，他抛妻别雏，毁家纾难，只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奏响了一曲为国为民的“侠”的乐章。“文革”开始后，他义不受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沉湖底，更是以生命践行了自尊自爱的“侠”的精神！

好“武”崇“侠”的个性特点，对老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一，在新文学阵营普遍轻视武侠小说的时代氛围中，老舍却试图创作“通俗”的武侠小说。他先是构思了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后又答应上海大众出版社的《小说半月刊》写一个武侠长篇《洋泾浜奇侠传》。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老舍未能完成这两部长篇武侠小说，却将前者提炼为优秀的短篇小说《断魂枪》，使我们由此可以窥见武侠小说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厚度。其二，侠义思想贯穿渗透于老舍的作品之中，即便是他的“高雅”文学，也闪烁着侠义的光辉。老舍的第一篇小说《小铃儿》即透露出作者崇尚侠义思想的端倪。小说叙写四个小学生为了雪国耻而苦练武功，他们组织了一个“会”，并且每人起了一个江湖名字：“一只虎”、“花孔雀”、“卷毛狮子”、“金钱豹”。老舍此后的作品更是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侠义故事：老张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洋车夫赵四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使他的阴谋泡了汤（《老张的哲学》）；文弱书生李景纯为解救弱女子而刺杀军阀贺占元，唤醒了浑浑噩噩的赵子曰的良知（《赵子曰》）；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弱国子民小马勇敢地打了英国人保罗（《二马》）；“猫国”一片黑暗，“猫民”麻木不仁，大鹰不惜以死来唤醒其觉醒（《猫城记》）；面对张大哥一家的灾难，毫不起眼的丁二爷挺身而出，扼死作恶多端的小赵，解了主人的燃眉之急（《离婚》）；阔少爷牛天赐公子落难，无以为生，四虎子、王宝斋的知恩图报使他重见希望（《牛天赐传》）；为了保住洋车夫们的饭碗，知识分子白李冒着危险率人捣毁车站，黑李则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保全了白李（《黑白李》）；一个不幸沦落的胖妇人与鬼子同归于尽，报了国仇家恨（《浴奴》）……。

## 二

在很大程度上，“侠”的光辉是依靠“武”来打造的。“行侠必须‘仗剑’，没‘剑’（武功）寸步难行；倘若自身生命尚且难保，任何济世雄心都只是一句空话。”<sup>[7]1018-1019</sup> 侠文化的独特魅力，既在于感天动地的“侠”的精神，也在于作为一种“灿烂的审美方式”<sup>[8]</sup>的“武”的技能。

老舍好“武”，以他对武术的爱好和了解，在作品中尽情展现变幻莫测的武功，也不是太难的事，《断魂枪》对王三胜刀法和孙老者拳技的描写就是明证。但是好“武”的老舍却没有沉湎于“武”的昔日荣光中，而是对其进行了理性的审视，表现了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奈何的退隐和终结，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前现代技能唱了一曲深情的挽歌。

《断魂枪》中的沙子龙，凭着他的一套“五虎断魂枪”，在西北一带走镖20年，“没遇见过敌手”。然而

曾几何时，“神枪沙子龙”却将镖局改成了客栈，自己做起了老板。对昔日镖局的伙计王三胜等人，沙子龙并不吝啬，“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可无论他们怎样软磨硬缠，沙子龙就是不传给他们招数，“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有时直接把他们赶出去”。面对慕名前来比武的孙老者，沙子龙宁愿请喝茶、请吃饭、送盘缠，甚至丢尽颜面，也不愿显露他的枪法，他执意“不传”：“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沙子龙何以“不传”？并非因为沙子龙已经失去了对“武”的兴趣，“不大谈武艺与往事”的沙子龙，却在《封神榜》的英雄业绩里寄托他精神的追求，到了“夜静人稀”之时，更会关起门来温习枪法，遥想“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沙子龙“不传”，是因为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在这个时代里，当红的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走镖已没有饭吃”，武功已不能给人“增光显胜”。即便传了绝技，又哪有施展之地？至多只能像王三胜一样在庙会上卖艺：“踢两趟腿，练套家伙，翻几个跟头，附带着卖点大力丸，混个三吊两吊的。”这无疑是“武”的堕落，为了维护“武”的尊严，沙子龙宁愿忍受难言的惆怅失落，也不愿将枪法传于后世。

《断魂枪》为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所有封建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都惨遭淘汰，“武”这一存续了几千年、制造过无数惊天动地的英雄传奇故事的前现代技能也不可避免地落伍、过时了。

如果说《断魂枪》因为篇幅的短小，题旨还比较隐晦，那么老舍对未竟之作《二拳师》的解说，则使这一意思表露无遗：“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了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一齐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sup>[9]</sup>

《八太爷》同样表达了老舍对新的历史环境下“武”的命运的思考，只不过“武”已产生了变异，其形式由刀枪剑戟变成了一枝“小黑东西”——手枪。大柳庄的庄稼汉王二铁衷心佩服《东皇庄》中的好汉康小八，一心一意要做替天行道、救弱扶贫的“康八太爷”，他卖了家里的地，买了一枝手枪后上了北平，结果还没来得及行侠就受到侦缉队的抓捕，又因日本人

压了他的威风而杀了几个日本兵，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日本兵的刺刀之下，连杀头前赢得观众喝彩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小说中村长的话指出了“以武行侠”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末路：“告诉你，二铁，而今不是那年头了。想当初，康小八有枪，别人没有，所以能横行霸道，大闹北京城。而今，枪不算什么稀罕物儿了，恐怕你施展不开。”

老舍毕竟不是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他对新的历史环境下“武”的命运的反思，具有更为深刻的意蕴。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sup>[10]</sup>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被强制性地纳入世界殖民体系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在“天朝上国”的梦中抱残守缺，还是在自我反省中急流勇进？作为牺牲在八国联军炮火下的旗兵的儿子，老舍在情感上痛恨给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的侵略者，看到了侵略者带来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在理智上却明白现代化是民族新生的唯一通道，因此他是以一种复杂的心情来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断魂枪》等文本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承载了深厚的人生底蕴与文化内涵，其表层文本叙述的是挑战——受辱——拒绝应战之类的武林故事，潜在文本则是对东方古老而神秘的生存方式消逝的哀悼，沙子龙们江湖生涯的中断，不仅是老舍对新的历史环境下“武”的命运的清醒认识，而且也隐喻了古老民族文化精神的式微和现代化的阵痛，寄寓了对现代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批判。

### 三

梁羽生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sup>[7]</sup><sup>[1039]</sup>老舍将作为“躯壳”和“手段”的“武”埋葬进历史的废墟中，可是并没有舍弃作为“灵魂”和“目的”的“侠”，他试图将“侠”的气质作为国民性改造的一种精神资源，通过激活、改造传统文化中“侠”的因子实现新民强国。

在南开中学任教时，尚未开始文学创作的老舍曾在双十节纪念会上做过这样的演讲：“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sup>[3]</sup><sup>[292]</sup>这段话表明了老舍对民族文化心态和精神面貌的关注，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由此成为后来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他早期的作品，无论是《二马》

的民族性对比,《猫城记》的隐喻象征,还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牛天赐传》的现实讽喻,笔锋所指都是民族的劣根性。后来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画面更为广阔,但也没有放松对民族劣根性的针砭。保守自私、谨小慎微、欺软怕硬、不思进取、逆来顺受、折中妥协、敷衍苟且、贪婪世故、怯懦糊涂、自私分裂……种种劣根性造就了国人的“好歹活着”,造就了民族的“出窝儿老”：“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聩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sup>[11]</sup>

老舍在批判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也在探索国民性的改造途径,侠义精神是老舍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资源之一,他试图将“侠”的气度风范转化为民族生命机体内战胜病灶、重获生机的基因,给衰老的民族打一针“强心剂”。老舍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身上均体现出侠者的古道热肠,透着骨子里的侠气,他们或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如《牛天赐传》中的四虎子、王宝斋),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应、王德、赵四),或扶危济困、救人水火(如《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二哥),或舍己为人、义薄云天(如《黑白李》中的白李、黑李),或手刃凶顽、除暴安良(如《离婚》中的丁二爷,《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或血气方刚、宁折不弯(如《杀狗》中的杜老拳师,《二马》中的小马),或为国为民、舍生忘死(如《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钱仲石、尤桐芳,《正红旗下》中的王十成)……通过这些正面人物侠义精神的展示,老舍具体而生动地指明了国民性改造的方向:激活传统文化中“侠”的因子,从中吸取符合时代要求的要素,改变民族精神的劣根性。

“历史地评价侠义文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同的时期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不同时期之间差别甚大;二是实践层次的游侠行为与精神层次的义侠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二者分离的趋势,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分离越来越明显,最后二者甚至背道而驰。”<sup>[12]</sup>行侠的性质不同,意义也就大不一样。对侠的不同性质、功能,老舍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挖掘、激活民族文化中早已存在的侠性的同时,还试图对其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将其引导到为国为民的轨道上来。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最需要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侠、真侠,而不是沉溺于一己恩怨的小侠、伪侠。老舍描写了各种侠行,他最为推崇的还是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将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作为侠文化的重要内涵加以大力突出。李景纯

说:“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紧的事!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支配下,他不惜以流血来保存国家的文物(《赵子曰》)。北平沦陷,一向闭门诵诗的钱默吟不但自己由一介儒生变成侠客式人物,上演了一系列萍踪侠影式的壮举,而且连儿子的性命都舍得牺牲:“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四世同堂》)其他如《猫城记》中的大鹰、《黑白李》中的白李、《鼓书艺人》中的孟良、《火葬》中的石队长、《茶馆》中的常二爷、《正红旗下》中的王十成等,均以侠行为国尽忠,为民造福,让人难以忘怀。“侠”在老舍笔下由此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发生了内在联系,具有了现代内涵。

## 四

“武”应退隐,“侠”须张扬,这是老舍对侠文化的基本结论;喜爱而不痴迷,既正视其历史命运的巨大转折,又将其合理内核化为新民强国的精神资源,这是老舍对侠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老舍超越一般武侠作家的地方。

老舍与侠文化的关系,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武侠小说的发展轨迹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走向来看,老舍代表了对待侠文化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理性反思态度。由于“东亚病夫”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兴起了大规模的尚武尚侠思潮。在这一思潮几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对待侠文化的三种基本态度:旗帜鲜明的肯定、态度决绝的否定以及辩证的理性反思。老舍无疑代表了后者。

鸦片战争后,民族主义成为席卷中国的狂飙巨澜,先觉者们开始了对民族自强路径的积极探索:其一是器物的更新,如洋务运动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力引进;其二是制度的变革,如维新运动对君主立宪的追求和辛亥革命对民主共和的尝试;其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即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新民”思潮。梁启超提出“新民”这一历史命题时,即明确指出了“新民”的具体途径:“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sup>[13]</sup>人们自觉地将积淀了几千年的侠文化视为改变“怯懦”、“文弱”的国民性精神资源,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蒋观云、杨度、汤增璧等人纷纷著文呼吁侠性的复归。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对侠文化多肯定而少批评,表现出一种旗帜鲜明的肯定。

经过先觉者的大力倡导和秋瑾、霍元甲等大批侠士的身体力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耻文弱,多想慕侠

风”的尚武尚侠风气。这种风气是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崛起的社会基础,后者的走红又反过来对前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武风极盛,此处略举数例:1920年代末,各省都成立了官办的国术馆,从1928年开始还连年举行“国术”的“省考”、“国考”,参与者甚众;1930年代初世界书局出版的新主义教科书国语读本第2册38课课文中,竟有7课是宣讲飞剑之术的;青少年结伴上山学道、访仙、拜师求艺的报道,也屡屡见诸报端。面对这种武侠狂潮,瞿秋白、郑振铎、茅盾等新文学作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瞿秋白认为武侠小说是“运用下等人容易懂得的话……来勾引下等人”<sup>[14]</sup>;郑振铎认为武侠小说代表着民族的劣根性,清末的武侠热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义和团运动的迷信与破坏性;茅盾认为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是“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是“精神鸦片”。显然,瞿秋白等人所持的是一种态度决绝的全面否定。

在今天看来,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无疑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当时也有一部分新文学作家对侠文化采取了一种辩证的理性反思态度,其中尤以鲁迅、老舍为突出代表。鲁迅“对侠文化进行了批判性改造,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文化与人格的双重建构”<sup>[15]</sup>,体现出一种“批判中建构”的雍容大度。老舍对待侠文化的基本立场是和鲁迅相似的,但是他的着眼点和具体结论无疑又与鲁迅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具有鲁迅不可替代的意义。老舍对侠文化的理性反思,丰富了我们对于侠文化的认识,也为今天继承、发扬其精髓提供了借鉴。

从武侠小说的文类发展来看,老舍的《断魂枪》等文本,可以视为百年“反武侠”历程的先声。有学者指出,从平江不肖生两种创作路向的内在矛盾,到白羽的凡人隐喻,再到古龙“欢乐英雄”的民众生活体验,最后到金庸的“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辩证发展的“反武侠”历程。这一历程“颠覆了传奇世界的武侠神话,使武侠小说

具备了现实的隐喻色彩并由‘古典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作为对武侠小说人文内涵的持续追问与反思,构成了武侠小说发展重要的内在动力”<sup>[16]</sup>。老舍对“武”的命运反思,与白羽的“大侠死于宵小之手”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考虑到《断魂枪》发表的具体时间,那么老舍在“反武侠”这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中的意义可以得到进一步彰显。《断魂枪》发表于1936年,其时还珠楼主风行天下,而“反武侠”的白羽尚未登上文坛,《断魂枪》由此成为“反武侠”的先声。

####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中国侠文化”主持人语[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26.
- [2] 韩云波.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J].天府新论,1996(1):58-62.
- [3] 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4] 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M].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85:31-33.
- [5] 刘红梅.老舍待人有侠气[J].可乐,2007(8):34.
- [6] 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G].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255.
- [7]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8] 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220.
- [9] 赵家璧.老舍和我(上)[J].新文学史料,1986(2):116-137.
- [10]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523.
- [11] 老舍.老舍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38.
- [12] 韩云波.从侠义精神到江湖义气[J].新东方,1998(5):50-56.
- [13] 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7.
- [14] 瞿秋白.吉珂德的时代[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16.
- [15] 陈夫龙.批判中建构:论鲁迅与侠文化精神[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26-31.
- [16] 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8-2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The Recession of “Feat” and the Advocating of “Chivalry”: Lao She and the Chivalrous Culture

WANG Xue-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As a writer who was born in a poor family and deeply influenced by folk culture, Lao She likes “feat” and venerates “chivalry”, which exerts influence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Facing old China’s ineluctabl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after it was compelled into the world colonial system, Lao She writes an elegy with deep feelings for the ex-modern feat; In the meantime, he tries to activate and reform the factor of “chivalry”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people and create a new powerful China.

**Key words:** Lao She; chivalrous culture; modernization; national character